

80 年代以来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新变化

代 帆

(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华人; 移民; 加拿大

[摘 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与推动下, 作为传统移民大国的中国, 其对外移民也表现出新的特征, 并且与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一道影响着加拿大国内华人移民的结构与面貌, 使之表现出与 1980 年代以前不同的特点。

[中图分类号] D634.3.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 (2005) 04-0074-03

2001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显示, 华人已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群, 数量从 1996 年的 86 万人上升到 2001 年的 102.94 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且日益变化的新群体, 自然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学者与研究机构的关注, 给国际移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西门菲沙大学都市移民和整合问题研究会 (Research of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Metropolis/Simon Fraser University)、阿尔伯达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等研究机构都对加拿大华人移民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笔者在此将他们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

一、“推”与“拉”: 政策、环境与移民

在华人向加拿大的跨国迁移中, 加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华人移出地的政治气候分别作为“拉”与“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华人的移民过程和华人族群的结构^[1]。

首先, 华人移民的结构与特征深受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影响。从 1867 年到 1960 年代, 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是基于种族背景, 英国与西欧的移民是“最合意”的选择, 而亚裔则相反, 因为他们是“不可同化的”。即使在二战之后, 尽管面临内外两种开放政策的压力,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依然是限制严厉。直到 1960 年代中期, “战后繁荣”的加拿大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工来维持经济的发展, 而此时西欧已不再能满足其需求,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加国政府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一向受到限制的地区——亚洲。作为这种转变之一的表现是 1967 年的移民积分系统 (Point Immigration System), 尽管这一政策也受到批判^[2], 但毕竟抛弃了基于种族和国家来源的歧视性规定, 使得受过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们得以移民到加拿大。到 70 年代中期, 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已超过发达国家的移民, 其中亚裔最多。在 1956 年到 1967 年间, 有 30546 名华人移入加拿大, 而在引入移民积分系

[收稿日期] 2005-08-12

[作者简介] 代帆, 男, 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统后,在1968年至1976年的8年间,华人人口就上升到90118人^[3]。与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颁布之前进入加国的华人移民相比,1967年之后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城市,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另一项对华人移民的结构和特性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1985年的商业移民计划(Business Immigration Program),这一计划吸引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大量企业家和投资者。此外,在90年代中期以来,加拿大强化了一项政策,即对独立移民(independent immigrants)和经济移民设立了高额奖金,因为他们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价值无疑甚于那些家庭移民(family immigrants)和难民移民^[4]。这一转变无疑导致了经济移民数量的上升,以及家庭团聚移民的下降。1996~2001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移民的急遽上升正反映了加国政府这一政策的转变。

其次,移民移出地的政治气候作为一种推力也无疑影响了华人移民。加国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3个地区,这3个地区的政治环境都影响了移民。就香港而言,二战后曾经有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发生在1958~1961年间的受香港农业的剧烈变动而导致的移民潮,第二次则为1967年的政治骚乱所引发,乃大陆“文革”蔓延的极端产物,第三次则是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因对香港前途感到忧虑而导致大量香港人移民海外。与香港一样,台湾的移民也因其外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而发生,如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等。同时,对快速工业化下的生活质量感到不满的台湾中产阶级也在八九十年代大量移民到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就大陆而言,发生在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构成了这股推力中的一股。其一是1973年中加建交,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大量移民,却为之后的移民潮打下了政治基础;其二则是毛泽东的逝世以及邓小平掌权,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人的跨国流动创造了经济基础。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加国政府也赋予了大量中国留学生以永久居留权。

二、华人移民的结构及其变化^[5]

加拿大登陆移民数据系统(Landed Immi-

grant Data System-LIDS)以各种指标体系对华人移民群体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数据显示,在1980年至2001年间,有755698名华人成为加拿大登陆移民,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分别占总数的49.7%、37.5%、12.4%,而就公民身份而言,他们则来自从阿富汗到赞比亚的132个国家。20%的移民于1980年代抵达加拿大,70%在1990年代,其他的则是在新的世纪抵达加拿大,在他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前,39%受到初等教育(九年及以下)、18%高中毕业、43%的人接受第二阶段教育(Post-secondary)。

这一群体在母语的使用中,58%的人讲广东话,30%的人讲普通话。其中男女各占47.9%、52.1%的比例,已婚、单身的比例分别为53.2%、42.7%。就年龄而言,20岁以下所占比例为25.6%,20~59岁、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65.4%、9%,由此可见大多数华人移民都处于工作年龄。就移民进入的阶层划分,独立移民人数最多(30%),其次分别为家庭移民(39%)、企业移民(11%)、投资移民(8.6%)。就职业来看,自然和应用科学领域的人构成了最大的职业团体(9%)。就定居点来看,大多数(87%)华人移民定居的是加拿大的大城市,接纳华人移民最多的五个城市分别是:多伦多(41%)、温哥华(31%)、蒙特利尔(7.8%)、卡尔加里(4%)、埃德蒙顿(3.2%)。在这五大城市所接纳的移民中,60%的人年龄介于20~60岁之间,与其他4个城市相比,蒙特利尔吸引了更多的年轻移民,而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则吸引了更多的年长者^[6]。

尽管加拿大华人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3个地方,但就这一华人整体而言,他们来自132个国家或地区,操100多种语言或方言,如南非的荷兰语、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笔者注)。上述3个地区的华人次团体(sub-group)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区别。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与台湾移民之间拥有更多的共性,即使在大陆移民内部,80年代的移民与90年代的移民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在90年代之前,香港和台湾移民的素质明显高于大陆移民。在80年代的移民中,大陆移民大多是家庭移民,且多为非熟练工人,很少受到中级以上(postsecondary)

的教育，英语水平逊于另外两个次群体。比如说，在1980年到1985年间来到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中，接受0~9年、10~12年、13年以上教育水平的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5.4%、15.2%、19.4%，而香港的移民的比例分别为35.5%、19.7%、44.9%，台湾移民的比例分别为41.3%、15.6%、42.8%。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现象开始发生变化，即大陆移民的整体素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1991年到1995年期间，大陆移民中接受3个阶段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5.7%、20.7%、33.6%，到1996年至2001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已经分别为30.9%、8.6%、60.5%，说明大陆移民在整体素质方面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已经超过了香港和台湾，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香港和台湾上述比例分别为36.5%、24.8%、38.7%和36.4%、14.7%、48.9%，这一数据同时也从某种程度论证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人才流失”。

三、华人移民面临的挑战

近期华人移民结构的变化给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工作者都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移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要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恐怕还有待时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华人移民在他们的文凭认证上遇到困难。一些研究发现受过专业教育的移民——不仅仅是华人移民，遭遇技能不熟被淘汰和文凭不被承认的问题。2003年发表的《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显示，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后，6/10的移民选择了与之前不同的行业。加拿大学者Basran和Zong 1998年对温哥华的华人和印度人的研究表明，在加拿大之外获得的专业资格在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上遇到了障碍，包括缺乏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语言能力不足、外国文凭不被承认和贬值等，由此导致了他们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后，社会流动性缺乏。

华人移民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语言障碍。《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显示，对来自亚洲和中东的移民而言，语言问题是最大的障碍。这一挑战在求职、寻求社会和卫生服务、接受进一步教育和培训中都构成了障碍。

华人移民在安居服务方面也遭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以及Shibao Guo和Don J.DeVretz的《华人离开者—居留者计划》研究都显示，70%的移民在加拿大的新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只是向家人和朋友求助，尽管非常重要，他们还是很少利用重要的社会和卫生服务。他们遭遇的障碍包括语言能力、服务信息缺乏、寻求救助的文化模式、服务者缺乏文化敏感性、财政障碍、服务缺乏实用性等。

参考文献

- [1] Shibao Guo, Don J. DeVretz, "The Changing Fac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working papers of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Metropolis, No.05~08, Feb.2005, p7
- [2] D.Matas, "Racism in Canadian immigration policy", In *Perspectives on Racism and the Human Service Sector: A Case for Change*, edited by C.E.Ja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93~102
- [3] P.S.Li, *The Chinese in Canada*,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 P.S.Li, *Destination Canada: Immigration Debates and Issues*,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3
- [5] 加拿大 Alberta 大学教育政策研究系的 Shibao Guo (郭士保) 和西门菲沙大学的 Don J. DeVretz 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可参见他们的论文 *The Changing Fac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加拿大 Landed Immigrant Data System (LIDS) 和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 的数据，这些数据展现了华人移民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级(class)、职业、出生地、教育水平、加拿大语言能力、母语、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结构与变化。
- [6] 以上数据源自加拿大 Landed Immigrant Data System (LIDS)，转引自 Shibao Gon、Don J. DeVretz 上文。

